

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从生存的观点看

马天俊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从生存的观点看

马天俊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生存的观点看/马天俊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年7月

ISBN 978-7-5609-4605-4

I. 从… II. 马… III. 人生哲学-研究 IV. 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6504 号

从生存的观点看

马天俊 著

责任编辑:熊选德 钱 坤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祝 菲

责任监印:熊庆玉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38 000

版次:2008年7月第1版 印次: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元

ISBN 978-7-5609-4605-4/B·52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哲学宏大叙事的各种罅隙乃是小叙事的温床，本书聚集了耕耘这一温床的若干收获。限时生存的个人在社会、历史、真理面前究竟有什么价值？哲学介入人的生存之时催生何种景观和难题？哲学的言说在何种意义上必定是一种修辞？修辞又如何关联于生存教化？问号似乎预订答案，但这并无必然性，诸多小叙事合起来也成不了候选的大叙事。哲学可能得到的尊敬之一乃是对哲学的拆解，这种拆解往往周期性地供奉到哲学的祭坛上。拆解并不毁弃哲学，而是毁弃哲学的某些幻想或自欺。

序

这个时代，熙来攘往又支离破碎。处身其间，哲学的工作方式也难免破碎。

哲学的破碎性，是症状，也是挣扎，甚或可能是救治。

往昔令人称羨，人类精神世界葆有满怀自信的完整。而今，五花八门似乎未曾崭露的问题撞击着人，反复振荡在生存与思想之间，使一向宏大、完整而彻底的哲学不得不以两种方式作业。第一种方式源远流长，仍以宏大的神圣叙事勾织完整的世界图景。第二种方式方兴未艾，它以处理“小型”问题为园地，却不必以小型结果为目标。

本书的言谈当归于第二种方式，它从宏大叙事退出，甘究小事，少发宏愿；淡漠于系统，热心于谱系；未来也可能有大模样，但更可能没有。大模样要慢慢长，才合乎自然。劈头就是大，终究空洞。现象学的一则箴言据说是把大纸票换成小硬币。本书的工作缺乏现象学的技法，但尝试践履其箴言倒真是私心所愿。

所谓“从生存的观点看”，自不免东施效颦之嫌，因为 Willard Quine 有一部书取名“从逻辑的观点看”。不避嫌疑，是因为这样取名最能标明本书的性质。

从生存的观点看，看什么？看人，看哲学，也看生存

本身。涉及主题既多，到处是一孔之见，所幸“孔”是相对稳定的，那就是生存。

但生存是什么？本书的运思方式无法给出严格界定，只能多方描述。整部书都是这种描述的努力。简要说来，生存是实实在在的，几有切肤之感，生存又是高深莫测的，令人心醉神迷。这也不算框定了生存，生存仍是不确定的。那么，“从生存的观点看”，什么意思？或许可以加上主语“我”，这至少把局限性标明了。然而“我”也是不确定的，统摄全书的“我”，不过是些痕迹罢了。

本书排列成五章，顺序却是随意的。一二三四五排下来，总诱人预期其中有内在的整体结构。不过本书的确没有这种结构，可以顺着看，可以倒着看，也可以跳着看。

目 录

第一章 个体的命运

权威

抗争

后人

真理

第二章 哲学的生存

奢侈的希腊人

诡辩的哲学家

不死的形上学

焦虑的哲学观

第三章 生存的哲学

低与高

乌托邦

进步与完满

灭亡与永续

理性与美德

生存的悲剧

第四章 言说的透视

重估修辞学

形上学修辞

知识论修辞

历史观修辞

我们的修辞

数学的修辞

哲学的隐喻

第五章 道路的歧异

中国与西方

事实与价值

跋

第一章 个体的命运

权 威

1 自启蒙以来,科学知识以专门化的方式空前增长,人类对世界的控制日益增强。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不可胜数的科学真理,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但吊诡之处在于:正如蝗虫的强大并不是蝗虫个体的强大,蚂蚁的强大并不是蚂蚁个体的强大一样,人类的强大也并不等于个人的强大。相反,个人陷入科学真理的汪洋,不仅如此,个人还陷入由走出真理汪洋的知识构成的汪洋,个人在其中体验到的不是强大,而是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

这种个体境遇使一种生存方式成为不可避免的:仰赖权威的生存。

在集合意义上,现代人对世界、社会和自身的了解可能比古人多得多。在个体意义上,现代人的见识往往比古人少得多,而且是碎片化的。每一个人都被教育和劳作限制在某一特定领域,他全部生活的大部分都是其专长未能涉及的,但他又不得不面对和处理这些不谙熟的事务。马克思说:“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

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①“痴呆”的职业人,在现代社会比马克思的年代更为常见,甚至所有的现代人都或轻或重地囿于这种状态。在此意义上,现代的个人必然处于日益强化的依赖状态。

依赖什么呢?依赖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权威。换言之,现代人需要不断地做出选择,但个人能用于选择的知识又相对不足,那该怎么办?只有求助于权威。今天,购物需要指导,医疗需要指导,旅游需要指导,就业需要指导,理财需要指导,甚至休息和辞世都需要指导……生老病死哪一样也少不了咨询和指引。就连心情不好也需要或被建议需要心理医生给予开导,看看电影也需要教育。事实上,现代社会正大规模地制造这类需求和相应的供给。个体对权威的依赖使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权威的价值。

个体对权威的依赖于今为烈,但不始于今日,它是整个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特别与启蒙的成就有关。虽然启蒙有很强的反权威倾向,但这与它重又确立了权威并不矛盾。事实上,启蒙的确树立了某种新的权威。

2 权威是一种权力形式,真理也少不了它的作用。比较而言,权威比暴力要和缓,但比暴力要全面而深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就根本而言,强制是最终的权力形式,但我们也不是一直处于这种状况。还必须考虑权威(由自愿服从者的信仰证明为正当的权力)和弄权(虽被行使但无权者一无所知的权力)。”^②

启蒙运动发轫之时,力倡科学理性、进步与个性,这使权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9.

②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43.

地位遭遇极大的批判。但这一过程与其说是反权威的,不如说是反对了某种特定的权威。作为结果,新权威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圣经》和教会的权威在衰落,急剧扩张并不断被引介到异质领域的经验科学代之而起。伟大的天才达·芬奇坚持认为:“我的作品正是出自于通俗易懂的经验,出自于真正的权威。……经验才是最高的权威,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引用这权威。……我不像他们那样引经据典,我依靠的却是更坚实而有价值的东西——经验,一切教师的教师。”^①

真正的问题不是需要不需要权威,而只在于到哪里去找这种东西。

达·芬奇决定从“引经据典”转向“通俗易懂的经验”。为了求真理,笛卡尔在读完古圣先贤之后,决定要凭自己的理性去“读世界这本大书”。恩格斯在论及理性启蒙时写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我们必须看到,这中间发生的并不是权威的退场,而是“外界权威”的退场。实际发生的,只是权威的转换。

1784年,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倘若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就使用自己知性的

① 里斯特编,莱奥纳多·达·芬奇笔记,郑福洁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6.

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状态就是自己造成的。Sapere aude! [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①康德把启蒙理解为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并认为这意味着人的成熟。但这只不过是人成熟到了把理性作为权威罢了。

理性的确可以消解许多权威,而理性自己借此却也成了权威——一种无人格的权威。

中古时期,真理必须与信仰结盟,从德尔图良到圣托马斯,都是如此。而今,真理却需与理性结盟了,没有理性的照准,就不会有真理。

无论如何,权威本身总是在的,使人容易产生权威消失了的错觉的,只是它在不断转换。

黑格尔似乎就有这样的错觉,他认为:“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轻于信任他人和信赖权威,相反地,他们要从自己的理解、独立的确信的意见来献身于一种事业。”^②马克思谈到路德宗教改革时的见解恐怕显得更深刻些:“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③青年黑格尔派的哲人施蒂纳也在相似的意义上认为新教把外在的教士转变成了“内心的警察”^④。

① 李秋零编译. 康德书信百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271.

② 黑格尔. 历史哲学. 王造时译. 北京:三联书店,1956:61-62.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④ 施蒂纳.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金海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95.

如果说权威是无法去除的,那么它也并不是什么阻碍人们获得真理而与人类偕老的“痼疾”,相反,它的好处是很大的。其中至为关键的原因在于人是社会动物。人需要联合而协调的统一行动,为此,个别性就必须被超越,个人从思想到行动就必须服从一个总体性指导者。真理的产生就与此关系密切。在希腊早期哲学中,真理是与意见(doxa)相对的。意见是多,真理是一,真理对意见的超越将产生统一性,这必须借助于权威来操作,这种权威可能是权威的材料、权威的思维方式、权威的检验程序,甚至是权威机构或人士的探索及认可。恩格斯从生产实践角度对权威给予了充分的认可,以批评极端的“自治”论者,他写道:“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①恩格斯这番论述,即使不局限于生产领域,也是有意义的。

现时代,启蒙所造就的最有影响力的权威是科学理性。在这样的时代,能够作为真理的真理,或者是科学理性本身,或者是已经取得了科学理性的认可和保护的无论什么东西(例如某些意识形态),或者是正在争取与科学理性相协调(例如中医学)的东西。

科学理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服了最具有批判力量的哲学。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大师圣托马斯认为哲学是神学的奴仆,他在《神学大全》中写道:“神学可能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是借它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清楚些。因为神学的原理不是从其他科学来的,而是凭启示直接从上帝来的。所以,它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上级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1-552.

和奴仆来使用:有如主要科学使用附属科学、政治学使用军事学一样。”^①近代哲学通过启蒙好不容易从神学的挟制之下解放出来,如今却又落入当年共同战斗的朋友——科学理性——的挟制之下,以至于法伊尔阿本德惊呼“哲学是科学的女仆”^②。其实就是那些渣滓文化(看相、算命之类),也在拉科学理性这面“大旗”,足见科学理性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如果说启蒙只是转换了权威,那并不意味着启蒙还不彻底,还需要进一步启蒙。相反,倒需要转换启蒙的权威观,或者说进行权威启蒙。这含有如下要点。

第一,产生权威是人类生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经济(economical)策略。首先,个人生命和精力的有限性,以及人类合作性生存的复杂性,使权威的出现成为必要。个人没有条件“亲知”与他息息相关的一切真理并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他人”给予信任,从他人获取生存资源。“他人”首先是具体的人,如父母、教师、官长以及专家。他们的行为模式的成果或机构也可以抽象化为权威,如信仰、理性或传统,以及政党、教会或政府。其次,随着人类社会的急速发展,真理日益繁多,也日益复杂,即使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也处于需要掌握却又不能全盘掌握的困窘和焦虑中。这就需要权威。每个人都会得病,但绝大多数人既不懂病理学也不懂药理学,就连生理学和解剖学也不甚了了。每个人都要“做人”,但绝大多数人既不懂伦理学也不懂哲学。每个人都要交往,但绝大多数人既不懂经济学也不懂社会学。这些都该怎么办?都需要权威!如果可能的话,凡事皆要亲知,凡事都自己决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61.

② 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36.

断,这自然是极有个体尊严的,但这肯定会降低生存效率,也浪费社会资源。事实上,亲知和自己决断的可行性在现代社会已经微乎其微了。

第二,权威依其本性无一例外是保守的,它会趋于僵化,限制创新。权威总是由业已形成的东西组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权威确有与人的超越发展相抵牾的方面。旧真理的权威总限制着新真理的出现和发展,而新真理也必须凭借自己稚嫩的力量来与旧真理作坚苦卓绝的抗争,以便日后取而代之。从布鲁诺到马克思的近代历史,就再好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一个以“后现代”为名、以打击理性权威本身为主旨的思想运动,虽然一些后现代作家只以“消解”为己任,但是,40年的历史还非常短暂,还是批判的初期。天假以年,最后的果实必定不会是纯粹的消解,而是伴随着新真理的新权威的出现,届时,人们的的生活方式也会出现新景观。

第三,权威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权威之间也竞争。权威的历时性淘汰或更新,其等效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即是诸权威共时性的并存和竞争。保罗·蒂里希很好地描绘了这种情形:

儿童最初接受的真理,是由成年人,主要是他们的父母灌输给他们的。事情也只能是这样;而且孩子是不由自主地接受这真理的。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性的回答,使探求真理的热情一时沉默下来,不论这权威是母亲或父亲,是一位年长的朋友或是一群人,或是一位社会模式的代表人物。但孩子早晚会起来反叛灌输给他的真理。或者把这些权威一起否定,或者以一个权威的名义否定另一权威。他会利用老师与父母抗衡,或以一群人的名义反对老师,以朋友的名义反对一群人,或以社会的

名义反对那位朋友。

这种叛逆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少年时代对权威的依赖无法避免一样。各种权威给予他赖以生存的东西，而这种反叛则使他对他接受或拒绝的真理承担责任。^①

当然，科学理性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权威，某些哲学、宗教乃至迷信也发挥着科学理性的社会功能。它们与科学理性竞争着对个人的占有权，个人在有些事情上也采用务实的态度而诉诸非科学的东西。保罗·法伊尔阿本德不信任医院，他自己治病时就曾求助过吉普赛人，也尝试过中医，并认为很有效。法伊尔阿本德倡导“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动摇科学理性的权威地位。他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开头就声明：“跟《反对方法》一样，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作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②归根到底，与人相比，科学理性是不重要的。出现与科学理性竞争的东西，从人的观点看，并不等于坏事。假如你要买鞋子，有两家鞋店总比只有一家好些。

3 无论权威是一个人、一个机构、一套学说或一种思维方式，它在这些形式中都是短命的。权威最持久的形式是习俗。对于习俗（在较为群体化的意义上）或习惯（在较为个人化的意义上）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它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更重要的了。

① 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何光沪编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751-752。

② 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

能够纯粹按照本能生活的人或能够纯粹按照理性生活的人,都非常稀少,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习俗来生活的。人类的大部分生存智慧凝结在习俗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浮现在制度、典章及学问中。与习俗相比而言,一切被人们叨念在嘴边的真理都是微不足道的。真理要是融入习俗,则真理就真正现实化了。而真理若是与特定的习俗冲突,那它就落入了最艰难的境地。

习俗由于其普遍性和日常性,很难成为反思批判的对象,这与其说是因为反思批判也有自己的盲区,不如说是因为反思批判在面对习俗时立刻就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一个金刚力士陷身于无边沼泽之时必定徒唤奈何。真理从未战胜过习俗,反倒要借助于习俗来成就自己。

只有在思想坦率而又遇到了尖锐难题的人那里,真理与习俗的关系才会显露出来。我们取一个典型来显示这点。1930年,爱因斯坦会见泰戈尔,晤谈之中爱因斯坦说:

我虽不能证明科学真理必须被看作其正确性不以人为转移的真理,但是我毫不动摇地确信这一点。……这……是我的宗教。……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我们这种自然观是不能得到解释或证明的。但是,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甚至原始人也不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东西,是我们不可少的——尽管我们还讲不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比您更带有宗教感情。^①

^①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70-272.